

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张车伟 王智勇 蔡翼飞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特大城市的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充分认识特大城市存在的人口问题,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文章以上海市为例,具体分析其人口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人口调控应遵循人口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趋势和城市发展阶段等因素来进行,而不应简单地以人口规模为调控目标。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应以结构优化为主要目标,突出市场化的手段,并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实施。

【关键词】特大城市 人口调控 上海市

【作者】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智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翼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已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目前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对于特大城市而言,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不断突破预先设定的目标,进而带来交通拥堵、职住分离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一些特大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设定了规模上限。例如,北京市设定的人口规模上限为2 300万,上海市为2 500万^①。然而,无论北京还是上海,都强调以人口规模为调控目标,但实际上人口规模是调控的结果,而不是手段。因此,人口调控需要转变思路,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人口流动的特征来进行。

* 本文为上海研究院委托的“上海市人口调控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人口—经济分布匹配性与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编号:13CJL06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上海市市长杨雄2016年1月24日表示,“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坚持综合施策,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 500万以内(http://house.qq.com/a/20160126/008910.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中国,无论是特大城市还是超大城市,都是外来人口聚集的重点区域,城市人口的膨胀均因外来人口流入引起。从全国来看,人口流动具有相似性,吸引人口流入的原因基本相同。因此,研究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基本可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调控思路和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选取上海作为典型城市进行分析研究。

上海市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不仅在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且其经济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因此,保持上海的经济竞争力和活力是人口调控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上海已经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十三五”期间,上海不仅要进一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更应发挥其作为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稳步增长,因此城市人口空间布局的优化至关重要。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特大城市人口调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人口膨胀是造成“城市病”的焦点(陆杰华、李月,2014)。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外来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北京市人口增长主要源于外来人口增长,尤以都市区最为明显(刘祥等,2013)。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对外来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而,就业人口膨胀成为诸多城市问题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调控的重要举措是分流就业人口(王继源等,2015),通过产业疏解的方式带动人口疏解。从城市空间形态和扩张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形成特大城市空间结构带状化、多中心化,以及分散化、碎片化等特征的主要原因(周春山、叶昌东,2013)。对特大城市而言,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契机,通过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带动人口结构优化(李超等,2013)。政府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城市发展方向,积极建立“有进有出、进出平衡”的人口动态平衡机制(段成荣,2011)。陈佳鹏、黄匡时(2014)总结了日本东京人口调控的经验,主要包括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布局,中心区高端化、引导城市由单一中心型向多核心型城市结构转型、建立都市圈及便捷的交通设施网络等。陈功等(2015)总结国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大体可分为五类:建立卫星城或次中心疏导战略、功能疏解和机构搬迁政策、注重法律和规划引导人口布局、通过调整产业布局调控人口、通过调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间接调控人口。对上海而言,通过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新一轮城市规划、通过城市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口规模(潘鸿雁,2015)。

尽管已有文献对特大城市人口问题和人口调控的研究较多,但多数只针对城市本身,即行政范围内的城市,较少考虑城市与周边的关联。然而,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与

周边区域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必须考虑相邻的周边区域。鉴于此, 本文将以上海都市圈为研究范围, 结合经济发展、产业变迁和人口结构等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上海及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政策建议。

三、上海人口发展状况

特大城市人口过多, 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所有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一样, 上海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使外来人口不断涌入, 从而导致人口过多过密, 进而引起各种“城市病”。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 上海人口迅速膨胀。1959年, 上海人口首次达到千万(王振等, 2014), 2007年突破2 000万, 2014年达到2 425.68万人, 已接近2 500万的调控目标上限。

从图1中可以看出, 上海的人口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 外来人口的比例可作为各个阶段的分水岭。1978~1983年为外来人口稀少期, 外来人口比例不超过1%; 1984~1987年为外来人口初步增长期, 外来人口比例在2%以内; 1988~1995年为外来人口涌入期, 外来人口比例在10%以内; 1996~2010年为外来人口膨胀期, 外来人口比例急剧上升, 从10%迅速上升至接近40%; 2011年以后为外来人口平稳期, 外来人口比例缓慢增长, 2014年达到40.69%。数据显示, 上海市户籍人口的增长平稳, 上海人口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 其根源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特大城市发展至今已不再是独立的城市, 而是与周边区域形成密切联系的有机体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采用“定量测度为主, 定性校核为辅”的方法^①, 对上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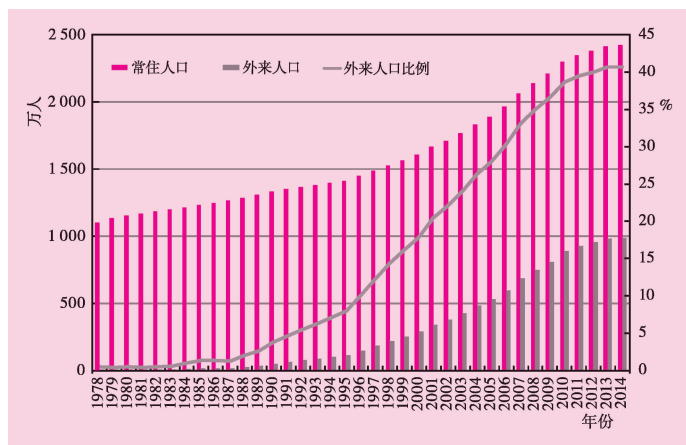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14年上海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 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都市区空间范围进行界定, 最终确定“以上海为中心约120公里范围内, 北到南通市辖区, 西至江阴—宜兴, 南抵慈溪—宁波, 囊括舟山群岛的范围”。然而, 要进行大都市圈的比较, 需要采用相同原则进行界定。因此, 本文采用经合组织(OECD, 2013)推出的“城市功能区”概念界定上海都市圈, 即城市功能区的范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划定以上海为中心、以通勤距离为半径的城

^①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发展战略研究》(<http://www.supdri.com/2040/index.php?c=article&id=221>)。

乡劳动力一体化市场区域。根据划分结果,上海城市功能区,即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半径为 40.7 公里,影响半径达为 98.9 公里(见图 2)。

这样划分的上海都市圈,不仅包括上海全市域范围,还包括与之有密切往来关系的江苏和浙江一部分县市区。这一范围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界定的上海大都市区空间范围略小,更加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分析上海的人口问题,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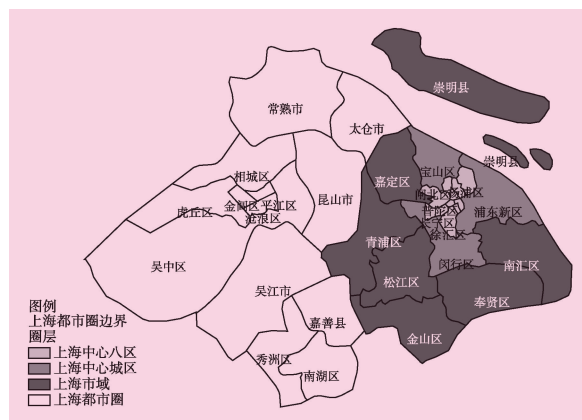


图 2 上海城市功能区范围

注:作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区县人口数据计算整理、分类。

四、上海人口问题分析

(一) 上海人口问题表现

结合已有研究和对最新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上海市和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心城区经济聚集不足,人口聚集过多

城市是聚集人口和经济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由于城市劳动生产率高,聚集的人口份额通常明显低于经济份额,在国际大都市圈中,城市经济与人口份额的对比普遍如此,中心城区尤为突出,这反映出中心城区高效率的特点。然而,上海中心城区聚集的人口明显过多,而经济的聚集却明显不足。

巴黎、东京和伦敦中心城区经济产出份额是其人口份额的 1.7、1.6 和 2.1 倍,是其就业份额的 1.6、1.5 和 2.0 倍。上海中心城区经济份额却低于其人口份额,与就业份额持平,但市域内非中心城的经济聚集程度较高(见表 1)。人口向中心城区的过度聚集也导致上海都市圈其他两圈层人口规模不足,2013 年上海内圈和外圈人口仅占 20.7%和 31.2%,而其他城市的内

表 1 上海与国际大都市都市圈内经济与人口份额 %

区域	巴黎			东京			伦敦			上海		
	经济	人口	就业	经济	人口	就业	经济	人口	就业	经济	人口	就业
中心	31.6	19.0	19.8	48.2	30.3	31.8	46.2	21.6	22.0	41.6	48.1	41.7
内圈	40.2	37.5	36.3	36.2	51.7	50.8	20.1	33.2	32.6	23.3	20.7	18.1
外圈	28.3	43.4	43.9	15.6	18.1	17.4	33.7	45.1	45.4	35.1	31.2	40.2

注:巴黎、东京和伦敦数据均为 2011 年数据。

资料来源: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OECD 网站(<http://www.oecd.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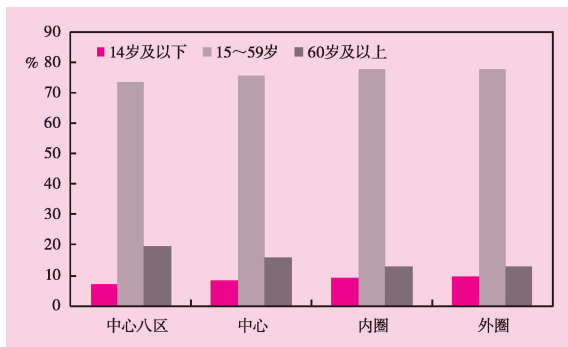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上海都市圈内常住人口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圈和外圈容纳了整个都市圈的大部分人口,东京内圈人口占总人口的51.7%,巴黎和伦敦内圈也超过整个都市圈总人口的三成。

2. 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

上海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其人口结构应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似,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从中心向外圈,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递增趋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见图3)。上海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

2010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5.07%,而北京市、广州市、深圳市该比重分别为12.54%、9.74%、2.95%,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位居四大一线城市之首。

3. 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比重偏低

国际大都市圈通常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的地区,是创新和研发的重要场所,因此,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储备充足,竞争异常激烈。这种激烈竞争的格局是大都市圈维持高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和发展高端技术的基本前提。与国内其他三大都市圈^①相比,上海都市圈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优于广州和深圳都市圈,但与北京都市圈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见表2)。

表2 2010年四大都市圈人口受教育结构 %

区域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
上海都市圈	3.28	17.12	38.60	21.00	9.50	10.51
北京都市圈	2.09	13.48	35.78	20.47	11.32	16.85
广州都市圈	1.72	19.73	41.16	22.41	8.03	6.95
深圳都市圈	1.00	12.98	49.20	23.50	7.63	5.69

资料来源: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城市行政范围来看,情况也类似。2010年,上海市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2.78%,高于广州市(10.49%)和深圳市(8.44%),但明显低于北京市(20.20%)。

4. 就业结构过于偏重制造业

上海市及上海都市圈内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均较高。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统计,2013年上海市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数的比重为29.79%,上海都市圈内制造业从业人数的比重为41.55%。相比之下,北京市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数的比重仅为12.46%;在东京都和东京圈,制造业从业人员占非农行业的比例分布为11.38%、14.04%。显然,上海市及上海都市圈内制造业就业比重远高

^① 其他都市圈也是基于OECD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标准来加以界定。

于北京市、东京都和东京都市圈。

(二) 上海人口问题的原因分析

人口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人口问题总可以从经济上找到原因。大都市人口的集中,并不只由于大都市的快速发展,还因为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刘波,2012)。上海人口问题的各种表现,实际上是经济问题在人口方面的反映。

1.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

在中国,上海经济发展处于最高水平,但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图4可以看出,2014年上海人均GDP为1.45万美元,不仅远落后于国际发达大都市,仅相当于纽约的25%、东京的40%,甚至低于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也略低于北京。上海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城市,需要较高的人均产出水平作为支撑,否则很难聚集国际最高端的要素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以看到国外大都市圈中心城区劳动生产率非常高(见图5),并远高于其内圈和外圈的水平。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心与外围的差距越大。例如,巴黎和伦敦中心是其外圈劳动生产率的2.5倍和2.8倍,东京为1.6倍,首尔为1.4倍。上海中心城区的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其他大都市圈,而且中心城与外围的差距很小,中心与外圈之比仅为1.1,说明中心城区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综合来看,与国际大都市圈相比,上海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区实力不强。因此,要改变上海都市圈中心区人口过密的格局,应着眼于提高中心城区的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和服务、金融等产业,进而把一些附加值稍低的产业转移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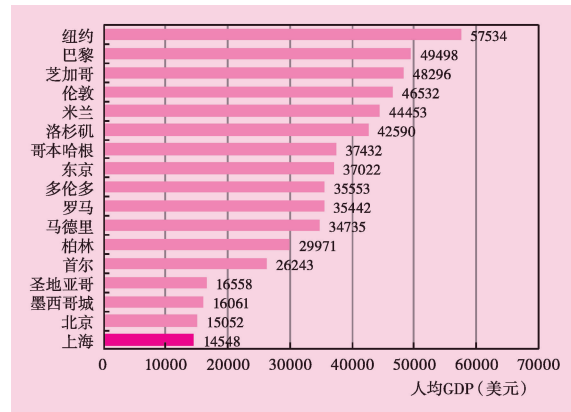


图4 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注:上海、北京为2014年数据,其他城市为2010年数据。

资料来源:OECD网站(<http://www.oecd.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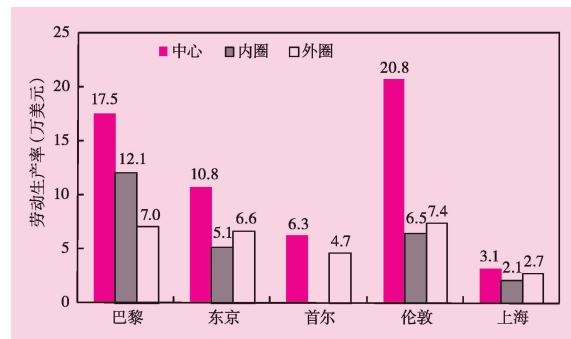


图5 国际大都市圈分层次劳动生产率状况

注:巴黎、东京、首尔和伦敦为2011年数据。首尔数据不全,只有内圈和外圈空间单元的数据。

资料来源:OECD网站(<http://www.oecd.org>);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2. 上海的产业结构尚待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过程是产业链不断向服务业延伸的过程,服务业比重也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市的服务业比重偏低、制造业比重偏高。纵观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都较高,2011年纽约、巴黎、伦敦达到或超过90%,东京超过80%。但上海2013年服务业比重仅为63.2%,低于国际发达大都市20个百分点以上。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上海经济基础密不可分。上海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工业都是其重要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且中国过去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国家需要上海发挥其在工业生产中的技术引领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上海经济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亟须发挥其在服务经济时代的引领作用。

从上海都市圈分层次经济结构看,上海中心城区第三产业比重仅为66.14%,远低于巴黎、伦敦和东京。上海内圈和外圈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6.7%和38.9%,大大低于其他城市(见表3)。与服务业比重偏低相对应,上海无论是中心还是外围,第二产业均占极高比重。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大城市都不可能依靠制造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只有具有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控制力的服务业才能支撑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前,上海特别是上海中心城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能与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相匹配的程度。

表3 上海都市圈三圈层经济结构比较

区域	上海		巴黎		东京		伦敦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心	31.69	66.14	6.35	93.61	13.21	86.74	5.39	94.60
内圈	52.70	36.69	13.51	86.48	25.91	73.52	17.29	82.64
外圈	63.03	38.93	17.86	81.76	37.47	60.73	19.44	79.96

注:上海都市圈为2013年数据,其他都市圈为2011年数据。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OECD网站(<http://www.oecd.org>)。

大都市圈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其中心城区又是大都市圈功能和产业的“灵魂”。中心城区产业层次高低和辐射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都市圈的地域范围,还决定整个都市圈的国际竞争力。纵观国际大都市,其中心城区都聚集了世界最高端的产业。例如,纽约的曼哈顿、伦敦金融城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巴黎中心城是世界顶级的创意中心,东京、首尔的中心城区是亚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五、上海人口调控思路与对策

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观点的梳理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上海的实地调研及与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座谈交流,形成以下对上海人口调控的认识。

第一,人口调控应立足中心城区的问题,放眼整个上海都市圈解决问题。以往人口调控

主要在市域内进行。但在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和交通、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城市功能区域与行政区域往往并不匹配,各种人口问题的产生都与这种不匹配紧密相关。在上海市域内调控,虽能部分解决中心城区的问题,但无法控制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总量压力。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一个特大城市人口的调整显然需要依托于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周边区域,因而上海都市圈是人口调控的有效范围。

第二,上海现有人口规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改变人口聚集的原因,就不可能有效改变人口聚集的结果。城市是人口、产业和各种经济要素聚集的空间载体。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是由于产业集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也就是就业岗位增加,从而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可见,城市经济增长是推动人口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当一个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人口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果行政力量阻碍了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产业扩张会因缺乏劳动力或者工资成本提高而提前终止。

第三,上海进一步聚集人口的潜力正逐渐式微,过度关注人口规模扩张会损伤今后的发展空间和活力。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上海是中国经济发达区域的核心,也是人口流入的重要目的地。但是,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趋于均衡,人口向上海集聚的动力正在减弱,具体表现为:一是区域间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二是上海经济减速导致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下降。数据显示,上海比全国更早进入新常态。由于人口流入动力减弱,上海市人口规模也趋于稳定。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日渐枯竭,可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很少。在这种形势下,上海人口调控已经没有必要将总规模作为主要目标。

第四,上海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人口调控应以结构性指标作为调控的目标和抓手。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国内外大都市发展经验表明,年轻化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是大都市不断创新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上海人口规模已经相对稳定的形势下,优化人口结构将成为上海实现“四个中心”的定位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当务之急。

我们认为,上海人口调控不应设置总量目标,而应通过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平衡。调控应设置结构性指标作为手段,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通过统筹上海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

(一) 不同圈层实施差别化产业布局政策,带动人口空间结构优化

人口分布是产业集聚的结果,产业布局的再调整才是优化人口空间结构的治本之策。同时,上海都市圈各圈层具有不同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的布局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中心城区人才资源丰富、信息渠道畅通、各项服务功能完善,适合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少量精品型都市工业,使中心城区聚集起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经济能量。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要素价格上涨和竞争效应的增强,对低端就业者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密度。内圈空间资源相对丰富,适合发展高端制造业、互联网+、文化创意等新型业态。新城经济功能的增强必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就能够协助中心城区疏解一部分人口,并截流新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外圈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也比较

好,通过发展医疗、养老、房地产和休闲娱乐等产业,将昆山、常熟、太仓、嘉善等小城市营造成为上海人口疏解的域外新城。

(二)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密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其集聚了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最优质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对人口流动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因此,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的关键在于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在“硬件”方面,应促进新城产城融合、构建职住平衡体系,选择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新城区域布置相关产业,使就业岗位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转移;从中心城区向外围新城疏解优质公共资源,改善新城生态环境质量和宜居条件,提高对人口的吸引力。此外,为便于中心与外围的交流,还应优化轨道交通体系,加强郊区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并在郊区新城之间、郊区新城与火车站、机场之间构建便捷畅通高效的交通网络。在“软件”方面,加快实现社保统筹,推动优质公共资源的空间合理布局,促进老年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域转移。在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的发达国家中,大都市的圈层结构是一种稳态的良性循环。而在中国,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和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均阻碍了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因此,要实现人口的动态结构优化,应从社保统筹和公共资源空间配置方面着手。不仅要上海市域范围,而且要在上海都市圈范围内解决这些制度障碍,从而实现人口的动态结构优化调整机制。

(三) 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打造人才聚集高地

上海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势必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然而,无论是与国际大都市还是与国内同规模的大都市相比,上海的高素质人才都显得相对不足。与此同时,上海的产业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也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撑。解决上海高素质人才不足的问题,要“内部育才”和“外部引才”双管齐下。在“内部育才”上,应着眼于构建现代化、创新型人才教育体系。既要建设好世界一流大学,也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体系,还要注重职业教育发展,形成结构合理、相互协调的多元化人才培育体系。在“外部引才”上,一方面应借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聚敛人才。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吸引人才、人才促进产业”双向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人才制度和打造各种平台招徕人才。应完善人才发展规划、改革人才管理机制及相关性法律法规制度,打破人才流动的隐性壁垒。建设高端人才发展平台,扶持创新创业孵化器、企业博士后流动站建设,为人才引进和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功等(2015):《京津冀“新首都圈”人口调控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光明日报》,3月25日。
2. 陈佳鹏、黄匡时(2014):《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东京经验及其启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8期。
3. 段成荣(2011):《从无序到有序: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
4. 李超等(2013):《北京市人口调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城市问题》,第8期。
5. 刘波(2012):《伦敦城市人口调控的经验及启示》,《理论学习》,第5期。

6. 刘祥等(2013):《2000~2010年北京都市区外来人口的空间结构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10期。
7. 陆杰华、李月(2014):《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以北京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8. 潘鸿雁(2015):《从上海市人口调控新政策看社会治理趋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9. 任远(2015):《关于特大城市人口综合调控问题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10. 王继源等(2015):《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
11. 王振等(2014):《上海市人口规模和结构调控形势与对策研究》,《社会科学》,第2期。
12. 周春山、叶昌东(2013):《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特征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第6期。
13. OECD(2013), Defini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Areas (FUA) for the OECD metropolitan database. <http://www.oecd.org/gov/regional-policy/Definition-of-Functional-Urban-Areas-for-the-OECD-metropolitan-database.pdf>.

(责任编辑:朱 犁)

书 讯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胡宏伟副教授等撰写的《公共政策分析视阈下的中国医改研究》一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该书是一部从公共政策分析视阈出发,全面梳理中国医改政策历程、评估中国医改政策效应的学术著作。

该书以中国医改宏观历史背景为脉络,以公共政策分析方法为基础,以医改五大领域为切入点,以新医改前后两大阶段为时间窗口(2009年以前的医改和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收集、梳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至今的主要医改政策和数据,并对各改革阶段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该书共包括十三章,前三章分别回顾了新医改前的中国医改历程、国际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改革实践与启示,并介绍了公共政策分析工具与方法;第四章至第八章重点围绕新医改中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城职保、城居保、新农合、医疗救助、商业医保),对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和效应评价;第九章至十二章分别围绕新医改另外四项改革任务,对各项政策改革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和效应评价;第十三章对中国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趋势、展望与改革路径进行讨论。

该书是国内少有的系统梳理和分析中国医改政策的学术专著,该研究立论源于国家新医改3年之后,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对医改总结、评估的需要。研究通过梳理中国医疗卫生与保险体制改革的整体历程,以及分析当前五大医改领域的现状和问题,结合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和工具,进而总结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规律,探索中国下一阶段医改的基本路径。该书兼具学术专著与政策工具书的功能,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政策实践工作者的有益参考。